

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代价

回归繁荣之路

《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
《卫报》年度最佳畅销书
《出版人周刊》年度最佳畅销书

[美] 杰弗里·萨克斯◎著
钟振明◎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代价

回归繁荣之路

[美] 杰弗里·萨克斯◎著
钟振明◎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的代价：回归繁荣之路 / (美) 萨克斯著；钟振明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1

书名原文：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

ISBN 978-7-308-12400-3

I. ①文… II. ①萨… ②钟… III. ①道德—研究—美国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9343 号



文明的代价：回归繁荣之路
[美] 萨克斯 著 钟振明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水玉银文化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62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400-3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献给我父母亲

西奥多和琼·萨克斯

他们是正义、同情心和幸福的完美演绎者

一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同时也必然是体现个人责任的著作：只有作者本人能够为其阐释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工作承担责任。与此同时，这样的一部作品也不可避免地是作者本人与其同事、朋友及家人展开无数次讨论和辩论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代价》这本书也是集体努力的成果，它是多年来大家力图理解美国正在发生着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社会进程的结果。

致谢

同以往一样，我的家人首先分享了我那些“半生不熟”的观点，然后又把其中最糟糕的部分迅速地从“加工这些观点”的厨房中扔掉。实际上，正是在厨房里，我同索尼娅（Sonia）、丽莎（Lisa）、亚当（Adam）、汉娜（Hannah）、马特（Matt）、安迪拉（Andrea）等人频繁地聚集在一起，力图通过讨论来理解日常经济新闻，并将各种片段经济新闻拼接成一幅更大的社会经济图景。我要感谢我的所有这些家人，多年来，他们让我得以利用在厨房餐桌聚集在一起的机会，交流大家对无数的调查报告结果、国民统计数据、总统预算数字以及堆积如山的专著和论文的看法。

我在地球研究所的特别助理安妮科特·莎哈（Aniket Shah）始终如一地帮助我创作。她办事干练，宛如我身边一位严格的领航员，帮助我组织、分析和筛选不计其数的学术资料和研究成果，并敦促我在创作过程中对所有阐释的问题做到更清晰、更集中，也更及时！如果没有安妮科特，就不会有这本书。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我们还非常幸运地得到新加入地球研究所的克莱尔·布尔格（Claire Bulger）的帮助。她那敏锐的意识和精准的分析让我得以驱散一些模糊的认识，并且在对本书手稿进行最后润饰加工时搜索出不少谬误之处。

如同往常一样，我的朋友和同事对书稿的不同部分进行阅读，并提出了他们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和评论，这让我受益匪浅。我在此衷心地感谢梅尔·斯坦普弗（Meir Stampfer）、约翰·麦克阿瑟（John McArthur）和福德·马杜基（Foad Mardukhi）对我的书稿进行的仔细阅读以及他们所提出的详细的评阅意见。我要感谢我的岳父沃特·厄里奇（Walter Ehrlich），他为我提供了对经济问题鞭辟入里的评论意见和对公共政策事件的独到解释，还对我书稿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十分详尽的评论。我也要感谢泰德·索伦森（Ted Sorensen），他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了他毕生信奉的关于政府作为维护和平及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存在的观点。由于他今年的离世，我们失去了一个展现理性、同情心和乐观态度的朋友。另外，同以往一样，我还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同事厄林·乔布里奇（Erin Trowbridge）和李克勇（Kyu-Young Lee），他们帮助我通过各种社会网络、博客和媒体辩论来对公共政策问题展开观点交流。

多年来，我感到美国的丑陋政治以及引发分歧的公共辩论一直在阻碍着人们对幸福的渴望和追求。去年前往不丹国的一次美妙之旅以及我同不丹国开明的政治领袖之间努力推动的关于“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让我更加清楚地理解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何以能够支持国民对幸福的追求。为此，我要特别地感谢不丹首相吉格梅·廷莱（Jigme Thinley）阁下、不丹国王吉格梅·基沙尔·纳姆吉尔·旺楚克（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k）陛下、不丹常驻联合国代表拉图·旺楚克（Lhatu Wangchuk）和不丹国民幸福总值

委员会的卡玛·特斯廷（Karma Tshiteem）大臣。

美国的政治话语已经让众人中毒至深，这部分地是因为许多媒体——特别是无所不在的电视和广播节目——不负责任地通过完全偏离真理和基本常识的节目来误导广大的观众和听众。正因为如此，我很荣幸有机会在一些展示了很好的对话、幽默和礼貌的电视节目中面向大众讨论本书中所提到的话题。我要感谢乔·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迈卡·布热津斯基（Mika Brzezinski）、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和查理·罗斯（Charlie Rose），感谢他们的专业精神和负责任的态度，感谢他们欢迎我经常参加他们的节目。

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地球研究所、联合国以及遍布非洲、亚洲和中东等地的现场调研活动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我之所以能够抽出时间来思考和写作，完全是因为那些才能杰出而又慷慨大方的同事们对我的工作在这方面予以关照的结果。我要特别地感谢我的办公室主任乔纳·鲁宾斯坦（Joanna Rubinstein）、我的高级行政助理海迪·克里特克（Heidi Kleedtke）、办公室主任助理唐纳德·威特（Donald Wheat）和苏泽特·爱斯比特（Suzette Espeut）、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中心的两位主管阿马登·尼昂（Amadou Niang）和比雷·白戈肖（Belay Begashaw）、地球研究所的首席营运官斯蒂夫·科恩（Steve Cohen）和地球研究所的主任助理彼得·斯科洛泽（Peter Schlosser）。十多年来，哥伦比亚大学一直是从事研究工作的理想家园，为此我也要深深地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伯林格（Lee Bollinger）的卓越领导。

我的编辑和文稿代理商通过他们的专业精神确保了这本书从最初的写作念头发展到最终成书出版。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编辑乔纳森·杰奥（Jonathan Jao）在本书出版前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总能贡献他的杰出才智和令人信服的观点。他的建议和编辑才能已经反映在本书的每一个精彩之处。唯一不精彩的地方，也许就是我没有完全听从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编辑给我提供的所有编辑忠告。正如我以前出版的著作一样，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和安德鲁·韦利（Andrew Wylie）在出版的每一个关键环节——从

文明的代价：

回归繁荣之路

最初思考如何写作一本有关美国政治和经济悖论方面的专著到最后书稿的成型——都给予我悉心的指导。在过去这三部专著的出版过程中，不难发现他们能够成功地让整个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紧密地衔接，让人感觉这仿佛是乘坐一架滑翔机，悠闲地起步滑翔，并最终成功而平稳地着陆。

对于上述所有的人，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想法的信任，同时当然也要免除你们对可能发生的任何错误承担责任。对于读者而言，我提前感谢你们会如同我之前的《贫困的终结》和《共同财富》这两本书以及其他著作和论文出版之后那样，因为同我开展对话以及共同学习而给我带来巨大的喜悦。

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

by Jeffrey D. Sachs

Copyright © 2011 by Jeffrey Sachs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3-171

目录

致 谢/ III

第一部分 大破产

第一章 诊断美国的经济危机 /3

第二章 繁荣的失落 /10

第三章 自由市场谬论 /26

第四章 华盛顿从公共目标撤退 /46

第五章 分裂的国度 /66

第六章 新全球化 /85

第七章 被操纵的游戏 /102

第八章 社会认识的误区 /130

文明的代价：
回归繁荣之路

第二部分 通往回归繁荣之路

第九章 “用心”的社会 /157

第十章 回归繁荣 /179

第十一章 为文明而付出代价 /207

第十二章 高效政府的七大特性 /236

第十三章 千年重生 /250

进一步阅读建议 /263

第一部分 大破产

第一章 诊断美国的经济危机

一场价值观危机

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一种道德危机：即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身上本该具有的公民美德的堕落。在一个只有市场、法律和选举的社会中，如果富人和掌握权力的人未能对社会中的其他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展现应有的尊重、诚实和同情，那么这种社会是有缺陷的。美国已经发展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市场社会，但却在此发展过程中将其公民美德逐渐抛诸脑后。如果不恢复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气质，美国的经济复苏就不会有什么价值，而且也不可持续。

在决定写这本书时，我自己都觉得惊讶，也感到很不安。在过去 40 年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认为，由于具备雄厚的财富实力、丰沛的知识储备、先进的科技能力以及民主的政治体制，美国有能力找到改善本国社会的方法。在我早

文明的代价：

回归繁荣之路

期的职业生涯中，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研究外国发生的经济挑战，因为我觉得不少外国的经济问题更加严峻，也更需要得到关注。但如今，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也感到担忧了。过去几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反映了我国政治和权力文化当中存在着一种极为危险且不断蔓延的恶化趋势。

在我看来，这场危机是过去几十年不断累积发展的结果。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并非是一种短期的周期性经济衰退，而是长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颓势。从许多角度上看，这场危机是整个时代——婴儿潮时代——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特定政策或特定总统决策的结果。它同时还涉及两党政治：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许多时候人们觉得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唯一区别就是石油大亨拥有共和党，而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拥有民主党。通过理解这场危机的根源，我们可以超越某些貌似真实的解决方案——诸如 2009—2010 年的“刺激”方案，2011 年的预算削减方案，以及年复一年地实施着的难以承受的减税方案。所有这些方案都不过是一些骗人的鬼把戏；它们只会让我国社会从真正需要的更深刻的改革中转移注意力。奥巴马担任总统的头两年表明，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失败比一个特定总统的政策失败更为严重。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曾经希望贝拉克·奥巴马能够实现某种突破。改变在发生，或者说因此我们还对他抱有期望。然而，比起那些微不足道的变化而言，更多的是旧事物仍在继续。奥巴马还在继续着没有尽头的阿富汗战争，军事开支仍然十分庞大，游说者仍然足以让政客们对其俯首帖耳，对外援助的金额仍然十分菲薄，削减税收的计划仍然是那么的不可承受，巨额的预算赤字仍然在继续，对于美国所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也仍然无心认真应对。政府内部充斥着游走于连接华尔街和白宫之间旋转门的各类官员。为了找到解决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本途径，我们有必要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政治体制会如此般抵制变革的发生。

美国经济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只服务于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同时美国的国内政治则未能通过诚实、开放以及解决问题的透明性等途径来让我们的国家走向正轨。太多的美国精英——包括超级富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及我所在学术界中的许多同事们——已经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庄严承诺。他们肆意

追逐财富和权力，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则被不断地侵蚀。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21 世纪初期的一个良好社会所应该具备的目标，并且要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开创性路径。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准备好通过多种行动计划来培育良好的公民意识：承担适当份额的税收；更深刻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需要；更多地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牢牢记住“同情心乃联结整个社会的黏合剂”这一道理。我认为大多数民众是能够理解这个挑战，并且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的。在撰写本书期间，通过就美国价值观问题同许多美国公民进行讨论或调查，我对美国同胞们的想法更加熟悉了。我对所发现的结果感到十分高兴。美国人民的表现同许多精英和媒体权威人士所想象的有很大不同。总体而言，美国民众是心胸开阔、谦虚且大方的。这可不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美国人的形象，也不是我们对美国的富人或有权势的精英人士所习惯使用的形容词。但是，美国人的政治体制已经发生紊乱，以至广大的美国民众无法对这些精英们进行有效约束。而且，政治层面的紊乱也影响到了广大美国民众的认知。美国社会太多地受到媒体无所不在的消费主义宣传的影响，以至于民众难以坚持一度富有成效的公民意识。

临床经济学

我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这意味着我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而不是某个特定部门的运行情况。我的基本研究理念认为，经济活动是同一个更宽阔的背景条件密切联系的，这个背景条件包括了政治、社会心理和自然环境等多种要素。经济问题其实很难在一个孤立的背景下得到充分理解，尽管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恰恰落入了这一研究陷阱。一位成功的经济学家必须在一个宽阔的视野中审视经济问题；他应当认识到，来自文化、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公众舆论、环境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限制条件都会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过去 1/4 世纪中，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家顾问，我的工作经历主要是通过诊断经济危机并找出办法克服某些关键经济部门面临的困难，来帮助国

民经济实现正常运转。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我必须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经济和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是如何地彼此适应，同时又是如何地通过贸易、金融和地缘政治的途径来同世界经济发生互动的。除此之外，我还要尽力去了解公众的信仰、国家的社会历史以及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使用一套开放的、兼容并蓄的工具。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我阅读了大量的经济数据和图表。同时，我也阅读了许多民意调查报告以及有关文化与政治历史的资料。我需要了解并比较政治领袖和商业领袖对经济运行所做的不同评论，也需要造访工厂、金融公司、高科技服务中心以及地方社团组织。关于经济改革的正确观点必须要经过不同层次的“真理测试”，从而在社区层次以及全国性的政治层次上都能行得通。

一个宏观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犹如一个临床医生，后者应当医治好患有重症及不知名疾病的病人。一个有效的应对办法应当包括对根本问题的正确诊断以及之后设计一套治愈疾病的办法。在我以前所写的一本书《贫穷的终结》那里，我把这种过程称为“临床经济学”。我的灵感来自我的妻子索尼亚（Sonia）。她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医学博士，正是她为我显示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临床医学所具有的魅力。

我并不是生来就能成为一名临床经济学家，但幸运的是我所接受的理论训练，加上我妻子给予我的灵感以及在专业领域上遇到的好运，使得我能够形成一条非凡的通往临床经济学的个人发展之路。我有幸在哈佛大学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并在之后的1980年成为哈佛的正式教员。随后的职业生涯中，我有幸参与了解决1985年玻利维亚面临的经济难题，并从此形成了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职业发展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债务累累的拉丁美洲国家在经历了20年军人政权的无能和暴力统治后，逐渐回归民主政治及宏观经济稳定。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又被邀请去帮助东欧国家和苏联，实现从集权治理到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型。那项工作接着又促成了我被邀请前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经济大国，在那里我可以就这两个伟大社会正在进行的足以改变世界的市场改革问题进行近距离的观察、辩论并分享真知灼见。